

面向 21 世纪中国报业 经济发展研讨会

广东论文选辑

(内部参考用)

广东省报业协会秘书处编

1997 年 4 月

广东省报业协会秘书处按：

中国报业协会于今年3月26日至28日，在北京隆重举办《面向21世纪中国报业经济发展研讨会》，这在中国报业经济发展史上承上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盛会。这是继1992年井冈山会议、1994年深圳会议后，中国报协又一次全国一百多家报社近二百名代表聚集一堂，一起来回顾总结这一伟大的实践过程，从理论上概括、探讨这一伟大实践的规律，以使其有理论的指导，推动我国报业经济更加健康、蓬勃地发展，以迎接21世纪的到来。

广东省这次参加北京研讨会的代表是：省报协副会长、南方日报总经理钟广明、印刷厂厂长陈岳松，省报协副秘书长、羊城晚报总经理林志东，广州日报副社长何向芹、发行处长张穗华，深圳特区报社长吴松营，深圳商报社长高兴烈，珠海特区报社长陈健雄、发行部主任陈钰，南方周末报副主编邝志强，湛江日报社长伍通、广告科长岑元冯，汕头日报副总编许其璋、时事部主任韩新忠和省报协常务副秘书长林思华等十五人。

广东省这次选出10篇论文提交中国报协研讨会。这些论文大多数是各报社的主要领导人亲手撰写的，有实践，有理论，都是水平很高的论文，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时期，广东省报业经济发展的概貌、报界同仁共同关心的大问题和发展蓝图。这些论文，受到与会代表所关注。其中，广州日报、南方周末、深圳特区报和深圳商报四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受到大会热烈欢迎。这批论文，是广东报业发展的共同财富，现编辑成集供全省报界同仁学习参考。

在研讨会上，中央有关部门的几位领导人分别作了讲话，这些讲话，所论述的问题很广泛，很精辟，很有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很值得广东报界同仁好好学习。为便于大家及早学习，现根据录音整理出来，来经本人审定，仅作为传达会议精神和学习参考用。今后，以《中国报业》上刊登的经领导本人审阅的讲话稿为准。

中国报协主席 许中田在大会上的开幕词

面向 21 世纪中国报业经济发展研讨会，今天在这里隆重开幕了。在此，我代表中国报业协会，向大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这次会议，在中国报业经济发展史上承上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97 年在我国历史上是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有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一是我们将收回香港，洗雪祖国一百多年来的耻辱；二是召开党的十五大，确定如何把我们的祖国带进新世纪。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适时的召开了这次研讨会，它的目的，一是中国报业经济取得很大发展的今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遇到了许许多多共同的问题，需要去探讨、总结、提高，以便形成共识；其次，在世纪之交，中国报业如何行动，是报界同仁共同关心的大问题，我们要有明确的目标，清晰的发展蓝图，以便动员报界同仁以坚定的步伐迈向 21 世纪。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这次会议显得更加重要，意义更加重大。希望我们全体与会代表能聚精会神地开好这次大会。

同志们，中国报业经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而不断发展起来的。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报社的老总们是不用担心经费的，每年由国家各级财政拨款，物资供应、出版、发行等等都是固定的渠道，在这样的体制下，报业经营管理单纯的很。自从党的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经济的深入发展，推动报业经济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最重要的是国家逐步减少了对报社的财政拨款，甚至最后到宣布“断奶”。这一过程对我们来说是十分短暂的，当然压力也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报业同仁，特别是经营管理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为了保证老总们集中精力办报，他们从大局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不但保证了报社的正常运转，而且逐步发展壮大自己，为报业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报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与报业直接相关的广告、发行、纸张供应、技术进步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效益和进步。并为保证报业顺利地完成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第一次技术革命，而且为告别纸与笔开辟了新天地。我国报纸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已初见端倪。因此，这些年来报业经济的发展成绩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中国报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不但依靠

我们自己的力量完成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交给我们的宣传任务，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而且还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壮大的自己，改善了报社的工作环境，报社员工的福利待遇有了明显的提高，有些报社还盖起了新闻办公楼，职工的住房得到了改善，从而稳定了新闻队伍。整个报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局面，报业经济发展使我们尝到了甜头。在这一伟大的实践过程中，中国报业经济的理论也不断丰富和发展，从“井冈山”会议正式提出报业经济的概念，到1994年深圳会议提出“正在崛起的中国报业经济”，到如今报业经济正式逐步形成了一门独特的部门经济，或叫“行业经济”。我们作为这一实践的倡导者，发展者，为此感到由衷地自豪。今天我们聚集一堂，一起来回顾总结这一伟大的实践过程。从理论上概括，探讨这一伟大实践的规律，以使其有理论的指导，推运我国报业经济更健康、蓬勃地发展，以迎接21世纪的到来。

同志们、朋友们，本世纪末的中国报业经济发展正方兴未艾，前景喜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结合报业经济的伟大实践，认真从理论上探讨报业经济在中国的实践、发展，以便使我们的确有正确的理论做指导，使我们的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使之更为丰富和进一步发展。为此，我们首先要认真遵循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继续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时的重要讲话，坚持以办报为中心，把握舆论导向，搞好经营管理，为办好报纸服务。报社领导要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进一步重视和加大报社经营管理的力度，坚持以办报为中心，采编和经营管理两个轮子一起转，增强报社的经济实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政治的角度高瞻远瞩，打好报业的经济基础，更好地搞好宣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武装报业，保证提高报纸印刷质量；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报社职工的福利待遇，稳定队伍，使编辑记者安心办报，为杜绝有偿新闻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作为报社各级领导，我们一定要进一步抓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给中国报业带来的难得的发展机遇，以迎接世纪之交新的挑战 and 很多难以预料的新课题。在全面深入贯彻党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的前提下，进一步熟悉、了解我国国情和我国报业现状与发展趋势这两个实际，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使报业经济发展得更快、更好，使之逐步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报业同仁应当为此而不懈努力。还有，在发展报业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五中全会提出的两个根本转变的方针，第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我们已经起步，并且形势迫使我们更好地适应；第二个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我们在这方面一直是比较薄弱的，更加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为此，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结合报业实际，做些深入的探讨，注意报社的挖潜改造，精打细算，加强管理。现在人才很缺，为此，我们不但要注意吸收新闻人才，更要注意吸收经营管理人才到我们队伍里来，现在有的报社把硕士、博士放到管理岗位上，放手让他们去干，有的印刷厂吸收的工作人员至少是大专

学历，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就不难发现优秀的经营管理者。为此，我们一定要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人员素质，是搞好经营管理，增强报社的经济实力，制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的保证。这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这次研讨会上，我们将就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如何发展，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其目标如何？我们应该怎样开创报业发展之路？如何建设好报业集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去思考去研究、去解决的。希望我们这次会议在以上这些方面能有所探讨和交流，使大家对 21 世纪报业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和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温暖宜人的春天里，我们报业的同志们欢聚在伟大祖国的首都，共商报业发展的大计，这充分体现出了我们中国报协“大团结、议大事、办实事”的宗旨，我为能参加这样一个报界高层的会议而感到高兴，见到许多新、老朋友而感到喜悦，希望大家在短短的几天的时间里能过的充实、愉快，有所收获。

最后，预祝这次大会在报业经济理论探讨上能有所突破，在实际经验交流上能有所创新，在未来发展战略上能达成共识。祝愿我们这次会议开成团结的大会，鼓劲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和中国报业向 21 世纪进军的动员会。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中宣部副部长 徐光春在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今天报协召开面向 21 世纪中国报业经济发展研讨会，我觉得很有必要。研究中国报业经济发展问题，是摆在我们报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进一步探索。应该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是很关注的，尽管最近事情很多，但是我还是抽时间听大家的意见，同时也想借这个论坛讲点意见。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推进，中国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的发展。不仅我们报纸的宣传面貌一新，更好地发挥了党政府人民的喉舌的作用，在正确引导舆论、团结鼓舞群众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而且，中国报业由原来的非常弱小的状况，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效益。这是中国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也标志着中国报业的发展过程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阵地。同志们，十一届三中全会你们就已经进入报界的话，那么这方面的感受会更加明显。当时中国的报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现在我们的报业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种鲜明的、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充分说明了在中央有关新闻事业发展的方针、原则、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报业变化是巨大的。前不久，中央有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谈到关于给报业以更多的投资和扶持的时候，镕基同志说：现在地方上最好的房子是报社的房子。后来，我们说最好的房子恐怕还不是报社的房子，是银行的房子，镕基同志笑笑，这说明中国的报业的确有了巨大的变化。不是最好的房子，恐怕也是相当好的房子，也不是少数报纸，恐怕多数报纸办公条件、事业发展都跟十几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现在已经盖起的大楼都是很有名的：解放日报盖的大楼、四川日报的大楼、南方日报的大楼，还有一个新的最高的大楼正在盖，就是深圳特区报的大楼，是四十八层，据说广州日报还要盖一个比它更高的大楼。大楼不是一个空壳子，恐怕里面看一看的确不错，如果从机关事业单位的办公设施来说，恐怕报社应该说是具有相当水平的。这些变化，当然是得益于中央的政策方针，同时也与新闻界特别是报界同志们的那种勤奋工作、强烈的事业心，以及积极的探索精神是分不开的，这一点是大家都有感触。中国报业经营工作必须抓，而且抓了这一段已经有好处，促进了整个副业的发展，下一个阶段我们还要继续抓，要坚定不移地抓、扎扎实实地抓、更有成效的抓。

中国报业的发展可以分为几段，解放前中国的报业是以办报为主同时也兼搞经营，

解放以后，我们的经营工作基本上是不搞的，我们当时党的方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完全靠党和政府拨款来搞宣传。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特别是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战略性的步署以后，中国的报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就是说，既要办报纸，又要搞经营，通过办报纸来促进经营工作。通过经营工作来扶持我们的报纸宣传。现在中央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务院有关部门，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报业要实行自收自支的财政政策，也就是说，报业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不仅要养活自己，而且要用自己挣来的钱来搞宣传。怎么样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第一点：报社要搞经营，这是大势所趋，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起来，报社搞经营，第一有条件，因为报纸做为特殊产品，一方面要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要传播新闻，通过传播新闻，去团结群众，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另一个方面我们的报纸也不无偿发放，它是有偿订阅，有偿订阅就有个经济关系，有个收入问题，所以在报纸的发行过程中，就有个经济工作的问题在里面。还有报纸有一定的版面用于广告的发布，广告的发布一方面直接为经济工作服务，而同时又给报社带来了一定经济收入，所以从报纸这方面的条件来说，搞经营是具备的，有条件的；第三个方面，现在政策要求我们搞经营，国家有关政策已经明确，报业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经营条件，面向市场，增加收入，确保报社的事业发展和人员工作、生活的资金来源，所以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在内，国务院有关政策也已经明确，要实行自收自支政策，中央这几家主要报纸尚且如此，地方报纸、行业报纸恐怕更是如此。第三点，根据我们这十几年的实践，中国报业完全可以通过经营来解决自己的资金来源问题，现在这些年来，我们报业应该说是比较火的，现在除了电视业以外，恐怕我们报业处在相当不错的地位。广播业在经济收入方面比我们差一些。而且这些年来，通过自己的经营，改善了我们的工作条件，增加了新的技术装备，而且继续保持了我们的新闻工作是一个受人羡慕的职业。现在一说要当记者，那还是蜂拥而来，其中除了它的政治地位以外，还有一定的比较高的或者比较有保障的经济收入有关。报纸应该说是一个事业，它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事业，他不竟还是个事业，国际上历来是把报业当做一个产业来对待的，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还可以探讨，我们还是主张不要纯粹做为一个产业对待，它带有产业的成份，但还是党的一个事业，有一个惯常的说法，叫做“事业性质，企业管理”，事业单位也要搞管理，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如果再加一个原因，第五点就是从当前情况来看，国家给予我们的财政方面的支持不竟还是有限的，现在国家的财力还是比较困难，我们还有一大批国有企业需要振兴，一千万待业职工的收入问题、工作问题要解决，六千万的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问题要解决，国家对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需要投资，而且改革的本身也需要一个经济保证，所以在今后及至相当长的时期内，那么多报纸，那么庞大的报业要靠国家财政支撑它是困难的，因此要靠报社经营的发展来解决我们经费需要的问题，从这个方面来看，要求报业要搞经营问题，这个思想要进一步明确而且

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

第二个大问题，也是跟大家探讨，就是怎样搞好报业经营问题。这个问题大家都在探索，我们这些年的探索，成绩是主要的，而且是可喜的。但是，我们这些年在报业经营过程中，也有教训，而且有些问题，从目前来看反映相当突出，必须引起报界的领导同志高度重视。这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呢？一是有的报社不能正确处理好办报和经营的关系，主要领导同志的精力放在经营上面，从而影响了报纸的宣传工作的正常进行。特别是社长、总编辑考虑经营的多了，考虑宣传少了。乃至报纸宣传发生了问题之后，社长、总编还不知道，要追查起来，说我没有管，这是某位副总编管的事情。甚至是总编管的事情，然后再由他出面处理这个事情。我们遇到了相当多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报社一把手的精力不放在报纸宣传上面，这是一个误区。第二方面的误区，是把经营工作和报纸的宣传工作完全混为一体，其结果是我们报纸的宣传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影响了报纸宣传的正确、客观、真实，这是一个要害问题。直接影响报纸的性质，直接影响到新闻工作者的职责，这个问题现在反映相当突出，对我们新闻队伍有严重的腐蚀作用。第三个方面的误区是把报业的经营混同于其他企业的经营一样，不善于从报业特殊规律出发，来探索和研究报业经济的发展规律，所以象一般企业的经营一样，搞一个公司、办一个厂、炒上房地产、炒上地皮，结果这些企业是搞起来了，我们也投入了，但是对报业本身来说，没有多少好处，没有多少利益，象“富和尚、穷庙堂”这样的现象，在报业所办的企业里比较普遍。富了少数人、个别人，但对整个报业贡献不大，甚至于还影响了报业的正常进行。由于产生亏损，或者由于经济方面的严重损失，经营工作不当，给报社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第四个误区是把报社的经常当作权宜之计，不是把报社经营做为一个新时期报社发展的必由之路来看待，反正是哪个人能来，赚一笔钱就行。这都是一锤子买卖。有些报社在社会上找了一些人，很能干，赚了一百万之后又拿走了，报社又抓瞎了。为了拴住他，一个劲儿让步，给优惠条件，“你还是留下来，你每年交我一百万，剩下都是你的，我们不管了”。好了，这样人就借着报社给他的这样一个政策，胡作非为，打着报纸的招牌，在外面搞违法违纪的经营活动，最后出了问题还是报社背着，因为它是你的企业。所以当前我们如何搞好报社经营过程中，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研究，特别是刚才讲到这些问题，应该说我一直是在思考这些问题，这两年一直在处理报纸宣传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大概分类是那么些情况。那么怎样搞好新时期的报业经营，我想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要处理好两个轮子的关系，一个轮子是报纸宣传，一个轮子是报社经营，现在看起来，我们报社这驾车必须这两个轮子一起转，才能推着前进，缺一个轮子都不行，搞个独轮车，歪歪扭扭的，报纸光是独轮车的话，就无法前进。在如何看待这两个轮子的问题上，首先一条，一定要把报纸的宣传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报纸的宣传是报业工作的根本，离开了报纸的宣传，我们报纸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就不叫报纸、不叫报业，就叫其他企业了。更何况在现在改革开放

时期，中央对报纸的宣传十分关心，寄予厚望，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报纸宣传十分关心，同样也寄予愿望。我们要在以正确舆论的引导下，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做出应有的贡献。尽管现在媒体的发展很快，除了报纸以外，这些年发达的是电视事。最近一个时期广播业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迷惘，现在也在逐步向着振兴的路上发展，相对说也比较活跃，现在又有一个新的媒体逐步地发展起来，这就是多媒体，也就是我们说的电子报纸，通过电脑传输新闻。尽管如此，报纸做为有那么长历史的传统的媒体，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还是离不开的，有它自己的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即使电子业、电视业再有新的发展，恐怕也无法取代报纸。所以报纸在整个引导舆论过程中，仍然负有十分重要的使命和责任。所以我们在报社工作的领导同志，一定要把这个思想确立起来，把报纸的宣传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如果报纸的宣传与报纸的经营这两个轮子相比较的话，应该说报纸的宣传更为重要，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所以我们报社的主要领导同志，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报纸宣传业务上，这是一层意思。另外一层意思，我们也不可忽视报业的经营工作，报业经营已经是我们报业宣传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如果说报业的经营不发达，我们报纸的宣传要搞得更好，手段要更先进，工作条件要有新的改善，报纸要走到广大的群众之中，为社会所欢迎，恐怕也没有这个条件和基础。所以报纸的经营工作也的确应该引起报社领导的高度重视，那种只关心报纸宣传，而不考虑和研究报业经营的思想，同样也是不对的，或者是偏颇的。现在有些问题值得注意，报业经营搞得好不好，同样影响我们的报纸宣传。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在香港问题的宣传上，中央电视台能否压住BBC，面对面的竞争？这里要有相当的物质条件，必要的物质装备是需要。报纸的宣传也有这个问题，比如：一些迫切需要广大人民知道的新闻，这两天报纸不收钱，但我们现在花不起，过去发号外，都是财政部拨款，实报实销，年底算帐，缺多少补多少，现在哪个报纸能这样搞？的确做为报纸的精神产品，我们不能把报纸的发行价格订得过高，它跟其他产品不一样，它是精神产品，主要是宣传中央的方针政策，要起舆论引导作用的。我们要使报纸让人民群众不仅爱看，而且能看（订得起）。我没有调查过，可能报协知道，我们报纸在我们职工群众的收入中，它的比例和西方报纸报价在西方经济收入的比例谁高谁低？粗略地考虑一下，我们的比例不会比他们的低，如果300元的工资，买一张报纸一元钱，即为1/300。在美国这个比例占多大的比重？所以一味地提高报价，这不是今后报业发展的方向。今年提了，明年还要不要提，不可能年年都提，所以应该说报价要有所控制，扩大发行量，增加广告收入来养发行的亏损这部分。少数报纸是靠发行赚钱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发行都是亏损的。这也是我们报纸性质决定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不考虑报社的经营，报纸的宣传的确也是搞不好的。因此要正确处理两个轮子的关系，办好报纸，扩大影响力，从而吸引我们的广告客户，增加广告刊出量，增加经营收入，来为报纸宣传创造条件，从而使报业能够比较健康全面的发展，

而不是畸形发展。这是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两个轮子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要正确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中国报业肩负着特殊的使命，我们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甚至在必要时，要牺牲经济效益，来确保社会效益，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不能一味地为了赚钱，把报业视同其他产业一样，煤炭、冶金、交通等，尽管其他企业也有个社会效益问题，但是其他产业是以经济效益为主，而我们报业应该以社会效益为主，现在在这个问题上，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没有偏颇的。我昨天收到一封信，是中国记协转来的，告唐山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在处理两个效益的问题上完全颠倒了，就是说要把报纸头条位置、重要版面，考虑经营问题，要让给钱多的单位，不要随便让版面编辑自己处理。他批评说，我们有些记者写稿倒不少（是一个广播电台的记者），节目时间都被占了，钱又挣不来，要把黄金节目时间让给那些来钱多的记者写的稿子，完全颠倒了，把我们的舆论工具做为一个赚钱的工具，首先我们这个舆论工具，是一个传播新闻的工具，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一点不能忘掉。现在这方面反映的问题比较多，大致是这样情况，中央新闻单位也并不是不存在这种问题，也有，但是不突出，比较突出的是一些地方的新闻单位，特别是地方的一些行业报纸，因为地方党委机关报多少还有点保障。这些行业报纸开始刊办的时候没有钱自己启动，然后好不容易批下一个刊号。你是归我的，一年给我这个机关五、六十人奖金和福利保证一下，其他的事情我们就不管了，你总编辑你自己启动去，既没有宣传任务的布置，也没有宣传工作的检查、督促，象这样一些报纸就完全倒过来的，它不是把宣传工作放在第一位的，不是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他的报纸的宣传上乌七八糟，什么都有，唯一的一条是这报纸有没有人看？能吸引人就行，不管你导向对不对，有没有负面效应，违不违反宣传纪律一切都不管。这样完成把两个效益的关系搞颠倒了。当然最后报纸还是要出问题，办不下去。新闻出版署对这样一些违纪违规的报纸一定会坚决处理，这些年停掉的这类报纸还不算少数，而且可以这样说，这样一种状况的报纸是要砍的，是一种挂靠性质，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部门的，是一个小金库，摇钱树，它不把报纸当做是一个舆论工具，一个喉舌来对待。它是作为一个部门的改革措施或者是创收的一个门路。象这样一些报纸，属于整顿之列。作为大多数报纸，一定要处理好这个关系，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要处理好两支队伍的关系。既然我们要两个轮子一起转，既然我们又要搞宣传报导工作，又要搞经营开发工作，所以我们的报纸一定要建立起两支队伍，不能打混战，现在突出反映出来的有偿新闻的问题，不是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拿一两百块钱的问题，有偿新闻的突出问题，就是编辑记者在搞经营，以新闻宣传为手段去赚钱，以报纸版面或者电视节目为载体去赚钱，这个问题反映的比较突出，所以这就涉及到报业怎样经营的很大一个问题，一定要两支队伍截然分开，没有两支队伍必须建立两支队伍，有总编室，有总经理室，不能总编室又是总经理室，总经理室又是总编室，那就麻

烦了。

现在这个问题相当突出，我们也相当忧虑，社会上群众对我们意见最大的是这个问题，不仅社会上对我们意见很大，新闻界同样对我们意见很大。很多编辑记者在那里叫苦，为什么？就是我们社长、总编给人家下达了创收任务，我们搞新闻工作的，这一点要明确，哪个国家也没有这样做的。第一，我们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不允许这样做。第二报业的本身发展规律、工作规律也不允许这样做。第三、也没有这样的国际惯例，叫编辑记者去创收。这样下去完全败坏了新闻工作者的形象，甚至有些总编辑用这个衡量编辑记者的好坏，谁赚钱多。又写稿又赚钱，肥了他自己的口袋。我们最近收到一封信，是上海一家报纸，不是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绝不是这三家报纸，是一张小报，一个女记者，刚从大学毕业的一个记者写的信，她是流着眼泪写的，说去年总编辑下达了十万元的任務没有完成。今年又是十万元的任務，在中宣部开的电话会议之后，回去跟父母说，父母也跟着着急，帮她想办法，怎么去搞这十万块钱，家里没有办法，叫哥哥姐姐帮助拉关系。如果我们的记者是这个样子，这怎么行呢？我们怎么培养出名记者、名编辑呢？名评论员、名主持人呢？如果这种事发生在我们总编辑身上，我觉得很对不起编辑、记者们，这是逼良为娼，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请大家注意，已经不止一次地来信反映，而这些反映都不是社会上反映的，都是我们报社同志来信反映的。谁去年完成了260万，谁今年就当上了总编室主任了，当上编委了。我说他既然那么能干，你就不要让他当总编室主任，你就让他当总经理室主任，经理部主任。这个问题要下决心解决，从长远计，报业要发展，必须要有两支队伍，而且必须要把这两支队伍分开。搞报导的让他兢兢业业地搞报导，搞经营的让他兢兢业业搞经营，不要搞经营的也来搞报导。我当总编辑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广告部同志说，这个事情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些版面，给你版面干什么，我们要有点关系或人家要发篇稿子怎么办。这样搞就乱了套了。因此最根本的一点，同志们，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在电视、电话会议都不讲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笼而统地讲，不要搞有偿新闻，不要拿红包，现在不能说报纸编辑记者都肩负着创收的任务，这话没法说了，说了以后国外的同行会怎样看我们中国的报纸？是中国的报纸完全变质了，变成是一个赚钱的工具了，这样看来，中国的新闻还有什么公正而言，谁有钱谁就可以上头条，就可以被说得天花乱坠，谁出了问题也可以逃避舆论监督，这并不是没有，已经发生了很多问题。要把我们经营工作搞好，大家要从长远考虑，要从根本考虑，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坚决把两支队伍分开，今后我们的报社里，一个是搞报纸宣传的，一个是搞经营的，都是专家，都是行家。西方并不是没有新闻丑闻，并不是没有，但是这一条在报界是明确的，编辑记者不能去赚钱，就是涉及到一些经济困难的报纸，这怎么办？我说你们赶紧下手，有的报社记者，报社跟我商量怎么弄，我就说记者站里记者不要拉广告，另外聘用一个人给你组织广告。这个东西一定要分开，否则的话，这样太不好了。现在是地方上给我们一些记者是有评价的，

各个报社之间都是有评价的，哪个报社的记者就是一天到晚挣钱的，拉广告的，我们见了他头都大，进了我们厂门马上就知道，今天又来要钱来了，又来拉广告来了；哪个记者我们非常欢迎的。来了以后就给我们做宣传，根本不提广告赞助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既然我们讲报社的经营工作不是权宜之计，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确立这个思想，一定要建立起两支队伍，并严格分开，这样有很多好处，也有利于专业人才的成长，这个专业人才包括报业经营的专业人才。报业的经营人才是一种特殊的人才，他既要懂报业，同时又要懂经营，他并不是哪个公司的老板，哪个工厂的厂长，随便哪个人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关系要处理好，在报社里要确立这样一个思想，就是搞经营工作的人并不矮人一头，这也是一个专业，这是我们中国报业几十年发展中，由于各方面历史原因造成的，这条腿短了，我们要让它强壮起来。所以报纸的有偿新闻问题要从根本上，从体制上解决，除了思想教育以外，还要从体制上解决，即经营体制和宣传体制分开，建立两个体制，两支队伍。这是第三个关系，应该处理好。

第四，是要处理两个利益的关系。这两个利益就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的想法，我们报社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我们要通过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经营开发来增加报社的收入，来增加报社的实力，那么这个实力怎么来，主要还是要靠我们经营队伍来创造。现在有一个问题要处理好，就是编辑记者的个人收入问题怎么才能处理好，这里一定要建立报社的大财务，也就是说要使我们每个编辑记者的个人收入的提高要建立在整个报社水准增长的基础之上，而避免报社的实力不强，而个人的收入颇丰，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我们现在有些报社内部有关的经济政策，恰恰是助长了这个问题，这是个人的收入相当高，而整个报社的经济实力的增长却很小或者几乎没有。甚至于有些报社从整体上说还是亏损的，可是个人的收入相当之高，甚至个人都买了小汽车，买了房子。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报业经营经营应该有什么样的机制，既能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同时也能确保我们报社的利益，而且有利于我们这支队伍的健康成长，而不要一味地钻到钱眼里，受到严重的腐蚀，最后的结果，我们的编辑记者对报社整体事业漠不关心，不管报社盈亏，发不出工资，我个人只要我拉到多少赞助，拉到多少广告，我个人今年就能拿到一笔，提成20%。20万的广告，20%也有几万块钱，至于说今年报社发不出工资，整个事业发展不行，这不关我的事，最后还影响到这个报社不行的话，我写了稿子，我给别家报社，不给自己这家报纸。有一次我拉了广告，谁的提成比例高，就给谁，这样对报社本身的利益没好处，而且从根本上来说，对我们队伍素质的提高很不利，他根本不关心集体，根本不关心报社利益，他就知道自己。我当记者，有那么两、三个大款的朋友，我一年广告有五百万，我就给你二十万就行了，反正我到张家报纸也宣传，到李家报纸也宣传。有关系的是年年旱涝保收，没有办法的编辑记者只能干瞪眼。这样在报社内部形成一种很不正常的人际关系，你报社的管理工作怎么搞好，搞不好的！我觉得有忍耐也好，没

忍耐也好，人家希望你报社整个的实力提高。所以我们报社每个人生活的改善，奖金的提高，还是要靠报社集体的力量，而不能助长个人的抱负。相对来说，对经营人员要适当有一点灵活政策，因为这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工作，一个是搞经营的，一个是搞报纸宣传的，报纸宣传绝对不能按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办事。两种不同的性质，两种不同的工作规律，也应该有两种不同的政策、机制，这是对的。但是在具体对待某个人的问题上，我觉得要适可而止。总体来说，报业经营的形势是好的、是健康的。但是为了进一步把我们报业工作搞好，的确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大家一定要抓住报业性质的根本，一个是要看到报业发展的趋势，再一个要立足我们报业处身的情况，自身的基础，从实际出发，来开展我们报业的经营工作。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第三大个问题，是报协成立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中田同志，老邵同志，还有各位副主席都做了大量工作，还有各个报社的关心和支持。期望大家在探讨报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现在体制上有一些问题，到底报业经营这方面的问题怎么搞，我现在完全是尽义务来讲一讲。中宣部主要是抓“四个人”任务。报社经营的工作，我虽然办过报，比对广播电视更熟悉些，而且有些感情。从我个人考虑，我刚刚讲了报业经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也来谈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这里我也想到一个问题，也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就是报业集团问题。报业集团大家都很关心，而且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已经确定了广州日报作为我们的试点，作为试点，就是我们想通过这个试点，摸索一些经验，到底应该怎样管理，应该怎样搞这项工作。这并不是说，其他新闻单位、其他新闻报纸，根本都不要考虑这个事情，并不是这样。尽管没有明确你是报业集团的试点，但是作为报业集团的问题，是大家都要思考的问题。而且都要朝这方向努力，当然也不可能我们有2000家报纸，就有2000个报业集团，既然是报业集团，那么就是要有若干报纸的合并，要形成一定规模，这样才行。所以我建议更多地考虑方向问题，我也跟大家说一点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因为关于报业集团探讨问题，我们也开过几次会，研究过这个问题，更多的不是考虑把我自己这家报纸怎么膨胀、怎样扩充，不是这个路子，主要的路子是在现在报业规模的基础上，怎样壮大自己，兼并别人，应该走这样一种道路，联合起来办报，你搞一个中国青年报的报业集团，中国青年报的报业并不是要新闻出版署再批三张报纸、五个刊物，你要把各个省的青年报统一起来，搞一个青年报的报业托拉斯。现在订报纸，人家指明要订经济日报，河北经济报、河南经济报，都在邮局订上了，结果一看不是要的经济日报。人家也有办法把河北两个字搞得小，下面几个大字“经济日报”，恐怕到农民还真弄不清是哪个经济日报。当然象经济日报它自身现在有几张报纸，有三、四张报纸，还有刊物，那么如果能把各省的经济报统一起来，形成经济日报的报业集团，这样也符合我们治散治滥的方针，而且也有利报业的管理，有利于舆论导向。现在面对50家经济日报，整个经济界怎么搞？经济日报，叫经济日报河北版、经济日报河南版，也有地方利益。

现在把报纸完全砍掉相当难，那一大批人怎么办，但统一起来一个刊号，报纸数量也减少了，一家报纸有若干地方版，构成一个集团，象这样一个路子，我觉得是值得研究和考虑的一个方向，而不是把我们每一张报纸扩充，本来有2000多家报纸已经够多的了，搞报业集团再给我批张报纸，光是两张报纸还成不了集团。另外，不仅是我们明确了报纸搞报业集团，其他报纸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去探索、去努力，不排斥这个问题。今天我就讲这么些不成熟的东西。同志们对中宣部的工作都很支持，报纸仍然是中宣部需要指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领域，希望报界的同志振奋精神、积极探索、同心同德、开拓前进，把我们中国的报业搞得更加兴旺发达，培养出更多的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讲得不的地方，请同志们批评，谢谢大家。（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 在大会上的讲话

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加起来，我们叫文化积累。一般我们主要倾向于精神财富，这两个财富的总和要有一个载体，把它保存下来，这个载体就包括有：书本、杂志，当然还有报纸，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书报刊。这个保存的方式不一样，有的图书相对保持固定的文化成果，它不是新发生的信息，期刊相对保持一个新发生的，但是比报纸又要固定点，比图书要快点，报纸就是最新的。所以我们在定义上是这么定的：报纸叫做散页的连续的出版物，是一张散的纸不装订的连续出版物，因为它要快。最早报纸的起源就是一张纸、一张传单贴在电线杆上，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快，今天发生什么信息我登出去，然后就发走了，明天再来一张；那么刊物的定义我们叫做成册的连续出版物。这是一本期刊，把它装订起来，但是它是连续的，它是月刊或是半月刊，它是连续出版物。唯有图书，它变成成册的不连续出版物。我这个出版社今年出20种书，明年可以出30种书，这种和那种没有关联，今天我出一个人物传记，可能是个曹雪芹，明天我可能写一本邓小平传，这两个没有什么连续关系。这三种东西在保存文化方面它有它的分工的，报纸是一种靠着信息的连续的叠加，就是今天有个信息，明天再有一个信息，信息不断的加上最后形成把它保存下来，所以我们说今天的报纸是明天的历史，但是就每一天报纸来讲，它是比较浅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确的东西，图书是一定成了知识后才能上书，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确的东西，图书是一定成了知识后才能上书的。那么在信息学上讲，信息是毛知识，它没有构成知识，它是信息的毛皮，它是信息的信号，我们平时讲气象知识，天要下雨，温度够多少百分之多少，百分之七、八十，那么天就要下雨了，这是知识。但是它可以表现为信息，我们过去讲燕子低飞，石柱发潮了，这是靠燕子的信息和柱子潮湿的信息来的，但它还不是气象知识，所以这个信息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東西需要更正，比如汉城奥运会期间，第一天得了一枚金牌，我忘了是路易斯还是约汉输，各家报纸抢着把这个信息报道了，当晚上再查，因为他有一个程序尿检，这一查，他服用兴奋剂了，他的金牌无效，第二天报纸又赶快发了一个把第二名提上来，这个信息就是头天的，到第三天信息是错的。但是做为报纸，他是对的，第一天看到的信息就是这个，他不负错的责任，但是假如你发现这个错的更正，这是你的错了，它就是不断叠加上去。那么作为期刊，它就稍微缓一点，他可能一个月登，它就对了。作为图书，它就不可能出这个问题。就是报纸作为一个文化积累当中，他是起一个特殊的作用，他是把不断地最新的东西积累起来，同时他也是一个文

化产品，就是我们平时叫包装，所以要求报纸要有文化质量。这次我们制定报纸管理标准的时候，里面谈到报纸文化质量，体现它的精神，那就是报纸的差错，错别字不得多于多少。我们最近刚抽查完中央部委的报纸，错别字的质量，过去抽查过大报的质量，一般万分之几，最好的就是万分之零点七，当时解放军报，就万无一失。这都体现他的文化。还有用语错不错，版面好看不好看，这都在报纸管理上扣一定的分的，还包括从美学上讲是美还是丑。格调，我们有些报纸为了招揽读者，在里面登上刺激性的东西，我们有一张部委的报纸，曾经出现一个通栏的大标题，就是“刘晓庆刊裸”然后登四个裸体相片，这叫没有文化质量，我们这种报纸没有文化质量你说它政治上到什么程度？也很难给他上纲，你说他信息假，也很难说，刘晓庆确实去谈话，就是他的文化不够，这是第三个属性。第四个属性就是商品信息，这个东西可能是禁止打开最晚的一块，就是报纸是不是商品，所以为什么我现在讲报纸是什么，是政治、是信息，还是文化或是商品？避免直用这个词，我们直说它有什么属性，它是一个综合体，报纸有商品属性，前三个东西体现在版面上，第四个东西它在版面上体现一点，比如广告，但主要体现报纸整体，整体作为一种产品，报纸都是一种产业，一张报纸做为一种产品，如果这个产品要拿到社会上去交换，拿到社会上去交换一定有成本，那么它就有利润，要实现流通按照商品所规定的一些东西和动作。这两年大家深有体会，纸张一涨价，老总就心慌，因为商品里含着成本，承认它在市场上，按着商品的规律来运转，我们这几年对报纸的成本核算，市场竞争、利润一大堆问题，因为我们是机关报，特别在三中全会以前的时候，全国186张大部分都是机关报，机关报在政治上是完全为政治服务的，那么在经济上的计划经济下的运作方式，就是国家给你拨了一部分宣传费，这部分钱就是让你花出去，它投进去后不是让你产出，你产出的是精神产品，就是给你钱让你花出去，需要盖大楼，需要买机器都给你拨钱，需要买纸张都给你拨钱。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有很多报纸钱国家不给你，而报社要算一算钱花出去我能挣多少，挣回多少我能扩大发行，我甚至多办一张报。去年我们开了一次兼并研讨会，有十二家报纸兼并，我们的钱从哪来的，不就是靠自己挣的吗！就民晚报首开兼并记录，花了二百四十万买了两张报，上海市没给他拨一分钱，他就要计算这个。商品属性就是报纸怎么流通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报上怎么作广告体现为商品流通服务。商品这个概念，很长时间我们不敢承认，这里面有一个很生动的数字可以说明，我们的广告很长时间认为登广告就是资本主义，在报社的管理上确实有姓社姓资的问题，92年小平同志叫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后，我们在管理上在思想上解放一下。92年初小平南巡讲话，92年6月份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有个讲话，提出了市场经济。过去我们用了很多的词，就是商品经济跟计划经济的结合，计划经济的补充，有机的结合，等等。只到那次江总书记提市场经济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好？过了四个月以后，全国开十四大，正式提了市场经济。这以后可以说，报纸管理理论一大突破。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报上毁言广告，好象说广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这

个报纸就是给人政治教育的，怎么会登一大堆商品广告呢？很长时间我们脑子就这个模式啊。所以1983年，我们国家恢复报纸广告，那年我们在全国的报纸广告的额是七千万。以后报纸广告逐渐涨逐渐涨，涨到去年年底是77.7亿，这个数字在中国的报业史上非常说明问题，大家应该记住这个数字。0.7亿到77.7亿，是一百多倍，这个一百多倍，如果你不承认报纸的商品属性，还是靠国家投，我给你钱你就给我登，用这个模式，就是计划经济拨款的模式，你这一百多倍七十多个亿的窟窿谁去补。我们四大块，咱们比广播电视是弱的，95年度报纸六十四亿的时候，在四大块中占第一，这比电视还多。这几年我们和电视经常是你上我下，估计这七十几个亿还能保持第一，再加上电视那块，广播那块，都要向国家要钱，你说这窟窿多大。我们财政部的同志在这，这就说明市场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发展它是自然的潮流的东西。现在你承认它是商品，至少它有商品属性，它才能给你去赚钱，它不是老填不满的窟窿。回顾一下我们这十七、八年改革走过的路，特别是92年十四大以后所走过的路，十四大上总书记提出了有二段最著名的论述，一段要搞市场经济，发展要利用市场杠杆，搞资源调配，到底好坏让价格规律起作用。第二段话讲市场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国家整个实行市场经济特别是系统工程，都要服从高速调整自己的位置。那么这十几年来，特别是92年以来，我们的报纸管理也可以说在市场经济这个大系统工程里，不断提高自己的位置。刚才讲从0.7个亿到77个亿，就很明显的看我们报纸在经营方面，自觉调整它的效率。这四个东西它互相是一个有机的关系，它不是孤立的。回顾一下我们解放以来报业的发展，可以说这四个属性表现为当我们对某一个方面过份强调一点的时候，它可能会表现为左；当某一方面强调的多一点，可能表现为右，我们报纸基本就是这个关系。当文化革命到了极端的时候，报纸就是政治、号角、武器，就是批判的阵地，把政治极端扩大到最大最大的时候，它就其它三个东西给掩盖了，信息没有了，那时候看报没有多少信息，文化没有文化味，就是口号。商品更不用说了，这时候就表现为极左，当我们强调某一方面，比如强调商品属性的时候，这些年有几张小报强调自己就是要赚钱，这个时候就排斥其它，就走到右的方向去了。为了赚钱，什么都可以登，登一点虚的，假的，黄的，黑的。报纸吊销，处罚都是这样。前年，我们处罚，吊销了两张省一级的法制报，一个吉林法制报，一个江西法制报。就是这样，按道理政治部门是最讲政治的，是抓政权的部门，它这个报纸为了招揽读者，里面登了很多案例，血淋淋的这些东西。如果这是讲法，我们法很多，经济法，版权法，我们民事上有很多法可以宣传。但是它除了强奸就是凶杀。他这个总编，可能不大象我们这样宏观的讲报纸的四大属性，但是他肯定意识到报纸的商品属性，我怎么登报纸就能卖钱，突出这一点，报纸就走向右，到最后就只好吊销了。还有一些虚假东西。94年，我们理了一下，新闻出版署公布了当年10篇假报道，实际上它也不是最大的，我们重点理了一下，广州出了一种酒吃了可以长寿，小平同志长寿就是喝了这种酒，美国副总统派专机来买酒。这都是我们报上堂而皇之，很